

LIDUSHIXUE YU MINZU WENHUA LUNGAO

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

徐希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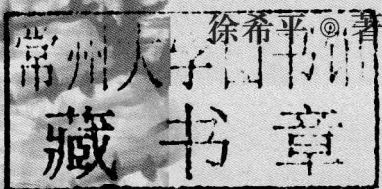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西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西南民族大学重点科研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重点人文科研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李杜诗学与 民族文化论稿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 / 徐希平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12

(西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08918 - 5

I. ①李… II. ①徐… III. ①李白 (701 ~ 762) —
唐诗—诗歌研究—文集② 杜诗—诗歌研究—文集IV.
①I207. 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0197 号

责任编辑: 毛乐燕

封面设计: 孟 龙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hs.com>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285 千字

印 张: 10.5

定 价: 3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8918 - 5 / I · 2309 (汉 2649)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目 录

第一编 李杜行迹与文献考辨..... 1

李白流夜郎赦归经湘汉行迹考辨..... 3

李白《赋得鹤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幕》甄辨 10

“蓬莱文章建安骨”之“蓬莱”试解 17

杜诗旧注权证 22

一、“狄相孙”非狄兼謩 22

二、“蚩尤”仍当作雾解 24

三、“宵旰”果真不通吗 25

四、“河阳”究竟在何处 27

五、“梓州李使君”为谁 28

六、“欲往城南望城北”之意旨 29

《全唐文》与李白诸集校读志疑 31

一、《全唐文》增删之举识鉴精审 32

二、宋敏求《后序》统计李文篇目有误 36



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

《全唐文》补辑杜甫赋甄辨	39
附：杜甫佚文《越人献驯象赋》笺注	46
第二编 李杜与民族文化	53
李白与少数民族	55
一、从李白氏族之争论谈起	55
二、李白对少数民族态度及所受具体影响	59
历代少数民族作家对李白诗歌的接受	66
一、唐宋辽金之概况	67
二、元代之鼎盛	69
三、明清时期之表现	76
杜甫和陆平等之民族意识略论	81
一、主张各民族友好交往，和睦相处	85
二、希望天下和平，永无战争	87
三、强调以德服人，攻心为上，反对 大兴杀伐，伤害生灵	89
杜甫和陆平等民族观之具体表现	94
一、广泛结交各族朋友，平等相待	95
二、广泛了解和接触多民族文化习俗，客观 描述和介绍，反映出博大宽广的胸怀	103
三、对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艺术营养的 由衷喜爱，兼收并蓄，吸收运用	109
杜甫对少数民族诗人的影响	118
一、杜诗学滥觞时期与少数民族诗人的互动	119
二、元代多民族诗人学杜之辉煌成就	122



三、明清时期少数民族诗人学杜概况·····	143
杜甫与道家及道教关系再探讨·····	150
一、与李白相识之前杜甫是否已有仙道之愿·····	153
二、杜甫离别李白后是否再无仙道之想·····	157
三、结论·····	166
杜甫《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画太乙天尊图文》试解 ·····	168
“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	
——杜甫《遣愤》试解 ·····	172
李杜思想与创作受道教文化影响之表现及其意义·····	179
一、引言·····	179
二、道教对李杜思想和创作积极影响之表现·····	182
三、结语·····	201
第三编 李杜诗学与影响 ·····	205
张籍、白居易与杜甫·····	207
一、创作主张的一致性·····	208
二、反映时事的敏锐性·····	211
三、艺术形式的承继性·····	217
博取众长独树一帜	
——杨慎《升庵诗话》论李杜评析 ·····	225
一、绪言·····	225
二、杨慎诗话论李杜条目·····	227
三、杨慎诗话论李杜之基本观点及主要内容·····	229
四、结语·····	243
方东树《昭昧詹言》论杜甫述略 ·····	245



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

一、《昭昧詹言》基本概况及论杜甫比重	245
二、关于杜甫述论的初步数量分析考查	247
三、关于杜甫诗歌的评价	249
《唐宋诗举要》杜诗选注略论	261
一、杜诗选录概况	262
二、杜诗校勘、注释之特色	265
“杜陵诗境在，寂寞古今情”	271
一、张问陶性灵诗创作理论与杜甫集大成 精神的内在联系	272
二、“诗人原是有情人”	278
三、“天意苍茫地苦贫，散漫哀鸿事可伤”	283
张戒《岁寒堂诗话》评杜述略	291
一、问题的提出	291
二、《岁寒堂诗话》论杜概略	293
三、张戒论杜的主要观点评述	295
四、结语	304
杜甫精神特质与现代意识的内在契合	306
后 记	325

第一编

李杜行迹与文献考辨





李白流夜郎赦归经 湘汉行迹考辨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李白终因从璘之事被判长流夜郎，遂由寻阳溯江而上，至江夏、汉阳，再泛洞庭，上三峡，抵巫山。时已次年之春，大赦令颁，承恩东返。这段行迹，于太白诗集中历历可考，故向无异议。但对于其赦归之后所行，则有不同之说，分歧之点在于湘汉一带，据北宋曾巩《李太白集后序》云：太白“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久之复如寻阳”^①。而清人王琦、黄锡圭分别所著之《李太白年谱》及今人詹锼先生所著之《李白诗文系年》等，则谓太白于乾元二年（759年）“还憩江夏、岳阳”，“复如寻阳”，^②其中詹锼先生还认为憩江夏岳阳后旋赴零陵，次年再归至巴陵江夏，^③然后“复如寻阳”。诸

① 曾巩：《后序》，《李太白文集》，158页，成都，巴蜀书社影印宋蜀刻本，1986。

② 王琦：《李太白集注》，6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1992。

③ 詹锼：《李白诗文系年》，139～1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谱十分通行，颇具权威，故其说几成定论，而曾巩之说则往往被人忽略。

那么，李白湘江行迹是否果如诸谱所言呢？核之当时交通线路，令人不免疑窦横生。因其流放与赦归，均须沿长江而行。去岁赴夜郎，由东向西溯江而上，故经江夏而泛洞庭（岳阳）。次年遇赦归，由西向东顺江而下，理当先憩岳阳继赴江夏，正如曾巩《后序》所记。若依诸谱所言，出峡江下荆门之后，未憩岳阳便达江夏，已是不可思议，既至江夏，不继续东下，却又掉过头来，西上岳阳，盘桓淹留后方再返江夏东归。这段行程，往复徘徊，且与上年行迹完全重合，构成一个环形轨迹，更是有悖于常理，亦不合太白急欲与家人团聚的心理。因而犹如纷乱扑朔的谜团，令人费解，难于信服。

当然，怀疑并不能代替事实，若事出有因，也不能排除太白徘徊湘江的可能性。在此不妨考察一下诸谱之说的根据，即有关诗文系年之准确性，由此证实本年赦归后太白是否存在再由江夏赴岳阳之行。因记载李白行踪最详的是詹锳先生的《李白诗文系年》（以下简称《系年》），差不多包括了诸谱的主要依据，故本文将主要就《系年》的有关部分予以商榷。

《系年》于乾元二年（759年）系诗四十余首，分别作于流放末期及遇赦初归之时的江夏、岳阳、零陵等地。其中江夏之作十三首，江夏至岳阳途中之作两首。江夏诗中有《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一首。诗云：“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赦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证明太白至江夏为本年，诸诗均依此而系。中有二诗题为《博平郑太守自庐山千里相寻入江夏北市门见访，却之武陵，立马赠别》，《将游衡岳过汉阳松亭留别族弟浮屠谈皓》。另外，其由江夏赴岳阳途中之二诗题为《答裴侍御先行至石头驿以书见招期月满泛洞庭》、《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此四诗可视作诸谱之说的主要根据，《系年》正是据此而谓太白本年“九夏居江夏，至梧桐叶黄



第一编 李杜行迹与文献考辨

之时去衡岳”。然细加考察，此四首诗除其写作地点无疑外，写作时间定于本年则大可商榷。

关于江夏启程赴湘时之二诗，先看第一首《博平郑太守……立马赠别》，黄锡圭《李太白年谱》系此诗于次年（上元元年即760年），《系年》系于乾元二年（759年）之理由为：“既称‘博平郑太守’，当在天宝之后。诗云：‘都忘虎竹贵，且与荷衣乐。’疑在太白暮年归隐之时，姑系于此。”看来詹锬先生亦觉其据不够充分，故以十分审慎的态度用了揣测之词。学界对此说已有质疑。如有人指出诗中所反映的责备时人不好士，并以侯嬴一类豪士自况的思想还是在去朝以后安史之乱前这一段时期最为强烈；又认为若系于安史乱起后的乾元二年（759年），以身为局势混乱地区的河北博州太守四处访友，于理不合。^①而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题目中“博平郑太守”这一地名与职官称谓。检《旧唐书·职官志三》：“刺史一员”，注云：“天宝元年改州为郡，置太守；乾元元年改郡为州，置刺史。”《地理志四》：“博州，天宝元年改为博平郡，乾元元年复为博州。”这就清楚不过了，官称太守和地名博平郡只在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之间，乾元元年便又恢复刺史和博州旧名，《系年》据太守改名之上限而谓诗作于天宝之后，却未考其下限，亦未考地名之变更，故系年未免偏晚。由此知博平郑太守之访当在乾元元年（758年）之前，此诗非乾元二年所作明矣。

第二首《将游衡岳……留别族弟浮屠谈皓》。黄锡圭《李谱》谓其为乾元元年（758年）流放途中游衡岳所作，《系年》以此诗有“青蝇一相点，流落此时同”之句而“疑指流夜郎事而言”，故系之于乾元二年（759年）。对此仍有可商之处。因为即使是流夜郎后之诗，亦应以去年西上由江夏赴洞庭期间所作的

^① 参李曼农：《李白天宝后期江夏、零陵之行考辨》，李白研究学会编《李白研究论丛》，157页，成都，巴蜀书社，1987。



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

可能性更大，何况以“青蝇”喻流放事未免牵强。按此典出自《诗·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后世皆以之喻进谗言之佞人，形容君子易被其诬陷中伤，如王充《论衡·商虫》所谓“谗言伤善，青蝇污白”。考太白生平，曾历两次重大波折，一是长安去朝归山，一是此次长流夜郎，两次打击，缘由各异，太白对之亦有不同之反应。前者具体原因难详，但被人谤谄是十分明显的，故太白去朝之后，言及此事，每每以青蝇玷玉来喻己之被谗，其《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诗云：“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王琦注引陈子昂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注云：“盖青蝇遗粪白璧之上，致成点污，以比谗谮之言能使修洁之士致招罪尤。”其他如《书情赠蔡舍人雄》：“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雪谗诗赠友人》：“白璧何辜，青蝇屡前”；《赠溧阳宋少府》：“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鞠歌行》：“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这些均为去朝后安史之乱前叙其长安遭谗失志之经历而作，表现出对谗佞小人十分憎恶鄙视之情，激昂悲愤，毫无妥协之意。对于从璘被放一事，虽然受害更重，但却是事出有故，且不乏为之推覆清雪者，谈不上遭谗，已不适合用“青蝇”之典，故太白之态度与前者相异。所谓“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旗，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或自叹自怜，企求援引，望君施恩，察其心志，如《赋得鹤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幕》所云：“珍禽在罗网，微命若游丝，愿托周周羽，相衔汉水湄。”《狱中上崔相涣》亦谓：“羽翼三元圣，发辉两太阳。应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这类语句比比皆是，却未再用“青蝇”之典。由此不难看出，此诗之“青蝇”句与被流无涉，而恰恰证明其写作时间与长安去朝之初所作诸诗相近，至迟也不当晚于天宝末，断非流放赦归后之乾元二年（759年）。

至于《答裴侍御先行于石头驿以书见招期月满泛洞庭》和《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这两首由江夏赴岳阳途中之诗，



第一编 李杜行迹与文献考辨

同样非本年所作。按二诗均为与“裴侍御”赠答之篇。《系年》于前诗之考证中引《求阙斋读书录》：“石头驿在嘉鱼之上，白螺矶之下，去岳州百五十里。公时在江夏，裴以月之初三、四至石头驿，约公速行，将以十五同泛洞庭，公答此诗时已过十五矣。原注称石头在金陵，失之矣。”意谓裴先赴巴陵，途中寄诗太白，促其速行，约定月满共聚于岳州，太白答诗时已过其期。除以上两诗外，另有三首赠裴侍御诗，题为《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酬裴侍御对雨感时见赠》、《酬裴侍御留岫师弹见寄》，詹锳先生均系之于前两首之后，谓其作于巴陵而非金陵，甚为精当，说明太白虽未如期抵达，但在稍后不久即与之泛舟洞庭，相互赠酬。然而，这段交往是否为乾元二年（759年）之事呢？欲知答案，不妨先看看裴侍御其人。检《光绪重修湖南通志·流寓》：“裴隐，官侍御，谪居岳州，与岫道人鼓琴自娱，李白流夜郎过之，相与唱和游宴。”詹锳先生亦以裴侍御即裴隐，则其此次赴岳州乃被谪无疑。那么，裴之被谪又在何时呢？按太白有《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一诗，王琦注云：“西塞驿，当在西塞山边。”又引《元和郡县志》，“西塞山，在鄂州武昌县东八十五里”，则其诗乃太白流放途中将抵武昌时作，《系年》编于乾元元年（758年），甚是。诗云：“扬帆借天风，水驿苦不缓，平明及西塞，已先投沙伴。”王琦注曰：“裴隐，疑亦当时逐臣，故用贾谊投沙事。”这就说明裴之被谪与太白之被放时间相近。且由“已先投沙伴”一句还可知此时裴隐亦已启程，与太白先后乘船溯江西上，太白船快，先至西塞，将达鄂州，而裴尚在江南地界，故太白于此“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诗中又有“龙怪潜溟波，候时救炎旱”，时为乾元元年之夏也。再观前面江上赠裴之二诗，亦分明为二人分乘船只次第西行于赴岳之江路，不过位序颠倒，裴隐反先行于前罢了。这就不能不令人生疑，鄂岳之间相距不过数日之程，既然当乾元元年（758年）夏太白行近鄂州时裴隐即亦启程赴贬所，且太白至江



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

夏后还滞留时日，至秋日方续行，何以于次年太白赦归还于江夏时，裴氏竟仍未达岳州，而且二人尚得以再度次第而行，相约于清秋之季同泛洞庭。如此巧合实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可见以此二诗为乾元二年（759年）之作是多么牵强，实际上除了以之与《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一道视为乾元元年（758年）先后之作外，其他任何解释都是难于成立的。这在太白到达巴陵后赠裴之诗中亦得到证明。《酬裴侍御对雨感时见赠》云：“祸连积怨生，事及徂川往，渺然一水隔，何由税归鞅？日夕听猿愁，怀贤盈梦想。”正是其流放未赦前实情与心境表现。其中“何由税归鞅”一句出自谢朓《京路夜发》：“故乡邈已复，山川修且广……行矣倦路长，无由税归鞅。”言其身不由己，无法休息，难以归家。这说明太白与裴隐唱酬于流放之途，而非赦归之后。即二人均于乾元元年（758年）相继启行，太白船行较快，先达鄂州，因在江夏滞留稍长，故裴隐反倒行于其先，且于将抵岳州之石头驿寄诗相催，约期月满泛洞庭，稍后二人便于岳州相聚酬唱。《答裴侍御先行至石头驿以书见招期月满泛洞庭》即此次答裴之诗，而《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则是其后近于岳州时所赠，二诗皆作于乾元元年（758年）无疑。

以上四诗既均非乾元二年（759年）所作，则诸谱之说即失去依据，本年太白赦归后先至江夏再返岳阳之可能性即可排除。诸谱以太白于湘汉间徘徊，不仅于理不合，还导致其他与之相关之疏误。如《系年》谓太白本年（乾元二年即759年）秋由江夏返岳阳，游零陵，至次年（上元元年即760年）春再归岳阳，然后归至江夏。故于上元元年（760年）系诗中先列《春滞沅湘有怀山中》、《送储邕之武昌》，次列《早春寄王汉阳》、《望汉阳柳色寄王宰》等。意谓前两首作于巴陵，后者作于江夏。然细味其意即可感两地之作时令相牴牾。按《早春寄王汉阳》诗云：“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昨夜东风入武昌，陌头杨柳黄金色。”联系诗题可知正为早春，则太白之达江夏当在



第一编 李杜行迹与文献考辨

春还之前，至迟当在去冬之末。而《春滞沅湘有怀山中》诗则云：“沅湘春色还，风暖烟草绿”，分明已是仲春丽景，此时尚滞沅湘，未见诗中有即刻动身之意，其与江夏之诗相触，显而易见。既然在初达江夏时尚未识春还，安得又先于沅湘已迎得春归，见风暖草薰？可见其非本年所作。不仅如此，再将其与赦归后至巴陵所作其他诗篇相对照，更可以现彼此心志殊异。因此时正值乱离，急需国土之际，故太白虽历经磨难而壮心不已，仍期效力于国。“握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临江王节士歌》），便是此时怀抱的表露。而上面这首《春滞沅湘有怀山中》则写道，“余非怀沙客，但美采菱曲，所愿归东山，寸心于此足。”旷达闲适，意欲归隐，既无遭受放逐之迹，更无百折不挠之志。恰与天宝中去朝后之心境相吻合，知其同《博平郑太守……见访，却之武陵，立马赠别》、《将游衡岳……留别族弟浮屠谈皓》两诗相隔不久，均为天宝后期赴衡岳阳时所作，《系年》因将乾元二年（759年）末至上元元年（760年）春太白江夏之行割裂为两次，将此沅湘之作编于上元元年（760年）春，失之矣。

这样，太白赦归之初行止之疑即可冰释，知曾巩《李太白集后序》所记较为确切。试稍作勾勒：乾元二年（759年），太白流夜郎至巫山遇赦，遂沿江而下，经三峡，出荆门而憩岳阳，此时已当本年之秋，又曾赴零陵等地作短暂之游，再继续顺江东下，于年内抵达汉阳、江夏，在江夏滞留至明年春后便径归江东、寻阳。



李白《赋得鹤送史司马 赴崔相公幕》甄辨

《全唐诗》卷一八五载李白《赋得鹤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幕》一首。诗云：

峥嵘丞相府，清切凤凰池。
美尔瑶台鹤，高棲琼树枝。
归飞晴日好，吟弄惠风吹。
正有乘轩乐，初当学舞时。
珍禽在罗网，微命若游丝。
愿托周周羽，相衔汉水湄。

此诗又见于同书卷二百一岑参集中。题作《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幕》。文字略有差异：“好”作“暖”，“周周”作“周南”，“汉水”作“谿水”。其题注云：“一作无名氏诗，一作李白诗，一本题上有‘赋得鹤’三字。”对这首重出诗，研究李、岑的专家们或存疑，或各执己见，未能断定。笔者以为此诗当为李白所作，后人误入《岑参集》中。

按此诗于宋人杨齐贤注《李翰林集》无载，最早见于《文